

由《淡新檔案》看清末臺灣番社租穀之「名」與「實」

吳奇浩

摘 要

本文以熟番地租中的番社租穀為考察中心，分析《淡新檔案》中記錄番社租穀的相關資料，觀察社租的收支詳目與收發過程，以明瞭此類番租的實質內涵，探討番社租穀是否能「名」如其「實」的使熟番受益。

首先，社職人員往往因乏銀辦理公務或繳交衙門陋規，而將番社租穀出典或胎借給漢人，番租的收益者因此成為漢人，而非熟番。其次，就租穀的收發過程而言，負責收發社租的社職人員自身即可能違法失職，如土目、通事、番業戶等皆曾侵吞番租，致使眾番之口糧無措。再者，由清末番社租穀的收支清冊，可發現有一部分社租是用來支付官府衙門的陋規需索與強制充公。這些問題都造成番租收入的減損。因此，番社租穀的收入數額並不同於熟番獲得之實際利益，也因此番社租穀的收入數額不宜直接視為熟番地權留存的證據。換言之，番社租穀的「番租」之「名」，並非全然符合其「番租」之「實」。

關鍵詞：熟番地權、淡新檔案、番社租穀、番租、社租

Discussing on the Rents of Aboriginal Tribes in Qing Taiwan from the Dan-Xin Archives

Chi-hao Wu*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land rents of the aboriginal tribes in the Qing Taiwan by analyzing the Dan-Xin archives, and in order for us to apprehend the substantial connotation by expenditure items of the tribal rents, to argue if the name of the tribal rents can match the reality to profit the aborigines.

Firstly, the tribal officers often don't have enough cash to handle official business or pay the customary fees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y have to pawn the tribal rents to the Han, and so the tribal rents are belonged to the Hans.

Secondly, speaking of the receiving and dispatching process of the tribal rents, the tribal officers sometimes broke the law and peculated rents, blasting the aborigines' subsistence.

Thirdly, through the inventories of the tribal rents, we can disclose a part of rents used to pay the customary fees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aforementioned points are the reasons of the decrease of the tribal rents.

Therefore, the amount of the tribal rents aren't equal to the interest which are the aborigines received, and the amount on the record of the tribal rents can't be regarded directly as the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aborigine land rights. In other words, the name of the tribal rents fell shorts of the reality.

Key words : the aboriginal land rights, the Dan-Xin archives, the rents of aboriginal tribes, tribal rents, rents

* Ph.D. Candidate ,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由《淡新檔案》看清末臺灣番社租穀之 「名」與「實」^{*}

吳奇浩^{**}

壹、前言

清代臺灣的熟番番社中，¹設有眾多社職人員，負責辦理各項番社事務，以及番社公有租穀的收發，如清末即有通事、土目、董事、頭目、番業戶、番差、甲首、管事等多種人員。²番社的租穀也因在不同社職人員的名下，而有眾多名目。各個番社的社職人員之設置均有不同，其名下租穀的支用項目亦不盡相同。其中大部分的社租是由通事、土目、番業戶與管事掌理，至光緒 14（1888）年劉銘傳推行番政改革，裁撤通事和土目，改置董事與頭目，掌理社務與社租。³總括來看，番社租穀係公有性質，除了

* 本文之完成，必須感謝林偉盛老師與洪麗完老師於寫作過程中所給予的鼓勵與建議。匿名審查委員也惠賜許多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文中之觀點與誤失，概為筆者之責任。

收稿日期：2005 年 7 月 19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5 年 12 月 9 日。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¹ 本文以「熟番」字代稱清代臺灣之平埔族，係基於完整呈現古文書記載及當時歷史情境之考量。

² 清代臺灣之熟番社設有多種社職人員，協助官方與民間處理地方事務。土目、通事負責一般社務的執行、調處社番糾紛、監督番漢間的土地交易，以及徵收和發給社租。番社公設之番業戶（另有屬私人性質者）則較專於負責社地的給墾、收租，以及分發口糧與屯租等事務。光緒 14（1888）年番政改革時，裁汰土目與通事，新設置董事、頭目。管事則係協助土目、通事收發租穀。另有甲首、甲頭、蔴踏與番差等，均為土目或通事的聽差。然而各個番社之社職人員。詳請參閱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年），頁 363-409；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 年），頁 117-122。

³ 番社通事原由漢人擔任，乾隆 22（1757）年以後漸改由番人任之，其原因與影響可參

必須繳納的正供以外，支應的項目包括番社之公務支出、社職人員薪資、社番口糧、屯番口糧（屯租、養贍租），以及官衙的陋規需索。

近年來，熟番地權流向漢人社會的議題因為牽涉統治政策、經濟型態、社會文化等眾多層面，而受到相當的關注。其中邵式柏（John R. Shepherd）與柯志明在對清廷治臺政策的研究中，亦以熟番地權的流失與否，作為評定清廷護番政策成效之依據，而番社租穀也於研究中被視為熟番地權留存的象徵之一。邵式柏指出由於清廷為保護熟番地權而設計的「番大租」制有其成效，因此光緒年間淡水縣轄下地區的番社租穀（通、土口糧租穀）仍歸熟番收取，熟番生計因此獲得支持而沒有遷往內山。⁴柯志明使用《淡新檔案》與《土地申告書》紀錄的番租資料，重建清末番租的坐落概況；並以清末仍有眾多番租（包括番社公有租穀與熟番私有租穀）留存於保留區的現象，論證清廷的番地政策經過乾隆 33（1768）年以及乾隆 55（1790）年的規劃之後，對保留區中的番租保護有一定的成效。⁵就兩者所舉證之留存番租而言，邵式柏舉證的是番社的通事、土目口糧租穀；柯志明所統計的番租則包括熟番的私口糧租，以及通事、土目與番業戶等收取的番社租穀。⁶兩位學者舉用的材料雖有不同，但是皆以番租數額來論證清廷之番地保護政策的成效。然而由番租的表面數據能否確實呈現當時熟番田業的實際運作情形？各類型番租的收發過程與實質效用如何？帳目上記錄的番租數額是否真能「名」如其「實」的嘉惠熟番，而代表清廷保護熟番地權的

閱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 368-393，437；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二版），頁 36-52。

⁴ John R.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5), p.2, 8-14, 239, 294. 邵式柏的參考資料是《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中〈設改章程總冊〉紀錄之光緒 14 年淡水縣轄下 17 個番社的通、土租穀。詳可參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19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頁 113-151。

⁵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317-325。

⁶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319、323。

成果？

本文使用的《淡新檔案》中，載有許多與番社租穀相關的資料，可供我們瞭解番租的實質運作內涵。⁷筆者由第一編「行政類」的第七類「撫墾」中，挑選較為完整、詳實的案例進行分析。一方面由此觀察番社租穀收發過程中發生的各種弊害，及其對熟番收入的影響；一方面分析番租的收支項目，以明瞭番租實際的支應對象。由這些記錄社租運作過程的案例中，不僅能發現社職人員與漢人管事侵吞租穀、社租因典借而流失、衙門陋規和胥吏索求等問題，致使番社租穀的收入大為減少，嚴重影響社番生計；而且審視社租的支出項目，並可發現其中與熟番生計直接相關者，所占的比率相當低。因此，番社租穀實不足以全然代表熟番所擁有的土地權利及所獲得之實際利益。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選取的《淡新檔案》材料係光緒年間淡水廳、新竹縣境內之案例，即清末臺灣中北部之事件。⁸誠然其不足以含括全臺灣之實情，具有一定的侷限性，但也顯現出一個值得觀察的面向。

貳、番社租穀之出典與胎借

在《淡新檔案》的 17212 與 17207 兩個案件中，可以見到由於番社缺乏現銀，而以番社租穀作抵押，或胎或典，向漢人借銀，致使番社租穀的

⁷ 《淡新檔案》微縮捲片，藏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1997年）。戴炎輝亦使用《淡新檔案》對番社租穀及社職人員作一般性之概說，但未以個案分析進行探討。詳請參閱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 363-464。

⁸ 《淡新檔案》所包括的行政區域中之熟番，主要屬於道卡斯族，故本文所選出之較完整的案例，也都是屬於道卡斯族人的相關案件。道卡斯族分布於今日臺中縣大甲鎮以北，沿著苗栗縣的海岸地帶，北抵新竹市，是一位於臺灣西側中北部的熟番社群。道卡斯族分為三大社群，分別是「崩（蓬）山八社」、「後壠五社」與「竹塹社」。此三社群之下的番社社名如下：(1)崩山八社：大甲東社、大甲西社、雙蔡社、日北社、日南社、吞霄社、貓孟社、苑裡社、房裡社等九社；(2)後壠五社：中港社、後壠社、新港社、中港社、貓閣社；(3)竹塹社：竹塹社、眩眩社。

收益者不再是番社與熟番，而是漢人銀主。其原因除了缺銀辦理公務之外，還包括缺銀繳納官府的陋規，番社租穀同時面臨漢人與官府雙方面的剝削。

一、番租出典（17212 案）

番社以租穀為抵押，向漢人借銀的情形，可見於 17212 案件的紀錄中。此係地稅與番社改革推行之前，官員訪查所得之回報。光緒 13（1888）年 12 月臺灣巡撫劉銘傳開始推動清丈整理田賦，進行地稅改革，欲將正供錢糧歸小租戶完納，而酌減小租戶所須繳納的大租額數。⁹在施行細則尚未確定前，由淡水廳知縣汪興禕訪查番社實情並稟報之，用以詳定「通土口糧大租」的處理細節。汪興禕於光緒 14（1888）年 4 月 16 日，呈報說明番社租穀的源起與問題：

卑職伏查通土口糧大租，係從前眾番丁向鹿港番衙門舉充通事、土目缺額，赴內山撫番，開闢荒地。墾成之日，定配口糧，即由該通土經手收租給發。其租額之內，或完番丁正賦，或納屯租公項，茲支給口糧外，其餘穀石作為通事等辛金，暨一切什用。^[1]嗣後番田有售與漢人者，另納通土社課、地餉等租。^[2]且有各社通土貧乏，借用民財，並將原領戳記為質者。^[3]是以此項通土口糧，名雖在而實則半歸漢人兼併也。現當驗契給單，一律陞科，轉瞬起徵新賦，亟應剔除積弊，逐社清理，明定章程，俾民番有所遵守。業經卑職將從前就通土按名示革，吊回原戳；另招殷實可靠之番丁，易其名約番頭目，仍取各社番保結接充，以除漢人兼併之弊。¹⁰（底線為筆者所加）

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5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209-212。

¹⁰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灣文獻叢刊第 15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435-436。

汪興禕發現其轄下番社之租穀有著有名無實的問題：(1)有些番田已經售給漢人，承買漢人則向番社繳納社課或地餉等番租；(2)番社通事、土目因為缺乏銀用，遂以向佃人收取番租的憑證—通事、土目戳記—為抵押，向漢人借銀。因此汪興禕於(3)描述通土口糧是「名雖在而實則半歸漢人兼併」，通土口糧租穀雖然名義上是番社租穀，但實際上大部分是由漢人管收。

為了解決通事、土目將番社租穀典借給漢人，導致通土口糧大租有名無實的問題，由汪興禕擬定、劉銘傳推行的改革方法，即行裁撤通事、土目，改置董事與頭目。¹¹但是過去積欠漢人的銀錢仍需清還，汪興禕指示裁減過去虛報不實的租穀，多出的剩餘租穀則用以清還之，以 7 年為限。同時也將淡水廳管轄下各個番社的租穀收支清冊一同上呈。¹²劉銘傳認為其所議妥恰，於是在光緒 14 年 5 月，飭令各廳縣比照辦理。¹³自此，各個番社的通事和土目皆廢除，改設董事與頭目，由董事督飭頭目管收番租。¹⁴所有通事、土目名下之番租改由頭目負責收發，希望藉此杜絕過去通事、土目侵吞番社租穀的問題。¹⁵也因此各個地方官府開始清查轄下番社之租穀。新竹縣知縣方祖蔭即奉令清查各番社戶口和租穀數目，命令差役前往縣內各保，與番社的社職人員共同查明轄內各社之社名，並統計各社所收的番租穀數額。我們可由各差役的稟報中，獲知當時番社租穀的概況。

依據差役梁鴻之稟，他向中港社的土目、通事查問，得知該社番租名目眾多：

番租名目有業戶、土目、通事、番差、神明、義塾、口糧各款，各配自收，內有出典漢人甚多。¹⁶

¹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35-436。關於番社董事與頭目的舉充過程，可參閱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 380-385、407-409。

¹² 淡水廳轄下各番社租穀的收支清冊於《淡新檔案》：17212-13 中，稱為「應收通土口糧租穀並應支應減各項用款數目四柱冊式」。參閱《淡新檔案》，檔號：17212-13。

¹³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35-436。

¹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42-643。

¹⁵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37。

¹⁶ 《淡新檔案》，檔號：17212-3。

各番租款項皆有負責配收者，但其中有許多番租已經出典給漢人。而竹塹社番通事衛紹基等人的報告也談到許多佃人繳納的番租都已經出典給漢人，交付漢人收執抵利：「且有祖父昔將佃租典與漢人，收付抵利，代遠年湮，口難得悉。」¹⁷此顯示不少番租透過「典」的管道流入漢人手中，而且衛紹基還說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出典的番租已經很難一一查明。可知熟番並沒有將出典之租贖回，而一直留存於漢人手中。

這些租業在實質上雖然已經歸漢人所有，但由於是熟番以此租業為抵押，出典給漢人，而不是經過杜賣等方式賣斷給漢人的。故即使熟番已無法由這份租業獲得任何利益，其名義上仍屬「番租」。由此可知，竹塹社轄下番社之租穀多有「名」不符「實」的情形；「名」雖為番社租穀，「實」則為漢人收執。

二、番租胎借（17207 案）

番社中的番業戶有代表全番社者，也有私人資格者。¹⁸出任番社業戶者的主要職務包括管理公有社地與佃戶的交易和收租事宜、口糧租穀的分發、繳納正供、支付其他社費，以及處理社務。¹⁹

在 17207 案中，雙藔社番業戶因為缺乏現銀辦理公務、繳納公項，而將番社租穀胎借給漢人銀主，借入銀兩，使漢人銀主成為管事，番租也就此落入漢人手中。光緒 9（1883）年 9 月 21 日，新竹縣竹南四保雙藔社番業戶潘長發具稟，其充任業戶以來，番丁供穀年款年清。光緒 9 年 5 月時返回內陸進香，委請管事劉廷璧先繳納應交款項，待其返臺後再收租還款。但同年 7 月回臺前往收租時，卻發現已被他人冒名向佃人混收、短折租穀，

¹⁷ 《淡新檔案》，檔號：17212-5。檔案中因殘破或模糊而無法辨識者，文中以「□」代之。

¹⁸ 依柯志明的研究，番業戶的設置可追溯至雍正 8（1730）年。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117-122。

¹⁹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 393-396。

並填給租單。²⁰而衙門的糧差楊源也稟報番業戶潘長發每年應繳納正供穀 42 石 2 斗，的確是交托城中廩生劉廷璧代納，但今年僅納 24 石，尚欠 18 石 2 斗。²¹光緒 10（1884）年 9 月，潘長發再稟告兩名佃戶抗納：林祿向林寶買的田業應納大租 20 石，抗不納租；何柳買林鳩山（一作林邱山）田一所，應納大租 24 石，亦抗不完納，甚至串通現耕佃人何無牙以假戳混收佃戶蔡苑記之大租穀 3 石。²²

然而依據其後的呈訴資料顯示，實情並非單純的佃戶抗納。光緒 10 年 11 月，房裡社番潘文瑞具訴何柳所買林邱山的田業每年應納的是房裡社私租 4 石，由潘文瑞家承收三代無異；潘長發到田收租時想與何柳串占混收，何柳不從，於是潘長發誣指此房裡社租業為雙藔社租業，何柳抗不納租。²³之後何柳也具呈其有兩份田業，一份係帶納房裡社番潘文瑞年租 4 石，與劉廷璧代收的雙藔社番租無關。²⁴而另一份由佃人何無牙耕種之田是他（何柳）向蔡苑記承贖，帶納潘長發之大租 3 石，已納 2 年。去年潘長發收租時先以「收單」為執據，言稱「清單」等待劉廷璧「往收割付」即可。但之後劉廷璧即以此「收單」誣控佃人何無牙假戳混收，何柳認為這一定是潘、劉兩人套謀所致。至此，雙方各執一詞，相互攻訐，必須要當面對質訊問才能明白真相。

就在新竹縣知縣彭達孫欲提集兩造人等審訊之際，²⁵有童生何實秋、蔡成章投稟表示其已出面調處，潘長發與何柳等人也願意和息，希望知縣能予以銷案。²⁶據何、蔡兩人所說明之原委，這次引起爭執的兩份田業，其一是何柳向蔡苑記承贖，再交給何無牙耕種，此田確實帶納雙藔社番業戶

²⁰ 《淡新檔案》，檔號：17207-1。

²¹ 《淡新檔案》，檔號：17207-3。

²² 《淡新檔案》，檔號：17207-8。

²³ 《淡新檔案》，檔號：17207-14。

²⁴ 《淡新檔案》，檔號：17207-18。

²⁵ 《淡新檔案》，檔號：17207-34。

²⁶ 《淡新檔案》，檔號：17207-35。

潘長發 3 石大租；潘長發先於光緒 9 年將此租交給林烏番代收，光緒 10 年又轉交劉廷璧代收（事實上是胎借給劉，故應由劉收取），何柳不知應將租交給劉廷璧，而被林烏番收去，以致相互控訴。經過調解，何柳願意再出 3 石租穀補還潘長發。至於另一份由何柳向林邱山購買的田業，係帶納房裡社番租，確實與此案無關。

在雙方相互呈稟的過程中，劉廷璧也提出證據說明他代收番租的緣由：²⁷

潘長發因乏項需費，並諭戳無項可領，爰懇向生（廩生劉廷璧）借去佛清銀一百八十大元，即將諭戳為胎，聽生於逢早季之時，協往催收，以便代填供丁等課。（底線為筆者所加）

光緒 8 年（1882）時，潘長發充當業戶，因為乏銀交納需費、承領戳記，遂以番業戶戳記為抵押，向劉廷璧胎借佛銀 100 元，又由劉廷璧代納正供 80 元，共計 180 元；光緒 9 年再借去 20 大元，光緒 10 年再借 113 元。劉並抄粘兩份借契，分別其摘錄於下。第一份是光緒 8 年時所立的甘願約字，潘長發等將番業戶諭戳交給振順號（即劉廷璧之商號）前去收租，並代納錢糧正供。²⁸

全立甘願約字。大甲雙寮社番土目潘義春、屯目潘立陸、（潘）成貴、陳金英等全眾社番等。因此本年正月間，僉舉潘長發出首充當業戶。因潘長發乏銀給領諭戳告示，春等全眾社番等會齊商議，向塹城振順號手內支借佛銀壹百大元正，以領諭戳告示需費，即振順號代納錢糧正供銀捌十大元正，記共佛銀壹百八十大元正。因潘長發無力清還，發再與春等全眾社番等商議，願將此雙寮社業戶諭戳交換與振順號，歷年前去收租掌管，認納錢糧正供。

²⁷ 《淡新檔案》，檔號：17207-23。

²⁸ 《淡新檔案》，檔號：17207-24。關於契約在司法判案中的重要性可參閱 Mark A. Allee, "The Status of Contract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Courts," in Madeleine Zelin, Jonathan K. Ocko, and Robert Gardella eds.,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59-177.

而且社內各款租穀需費，照舊交予土目設法，與振順號無干。以外所剩租穀，如數慨付振順號收為抵利，不得阻止。此係仁義交關，甘願喜悅，各無反悔，異言茲事。口恐無憑，立甘願約字壹紙，付執為炤。

即日批明：發與春全眾社番等親收過字內式次佛銀壹百捌十大元正足訖。批炤。

再批明：發與春等全眾社番後日若無銀清還，此諭戳任振順號主裁設法。再炤。

再批明：社內所有各款條例需費開列於左。再炤。

一、應款社內業戶辛金谷伍拾石。

一、應款社內祭田穀式十五石。

一、應款社內中元穀壹拾五石。

一、應款社內義學谷肆拾石。

一、應款社內把隘谷伍石。

一、應款社內土目辛金穀式十五石。

在場眾番等各有花押。

光緒八年歲次 月 日

全立甘願約字

雙藔社番土目潘立陸 潘義春

屯目陳金英 潘成貴

（底線為筆者所加）

在這份契字中，雙藔社番業戶潘長發因為乏銀領取諭戳，而向振順號借入 100 大元；²⁹振順號又代為繳納雙藔社之錢糧正供 80 大元，總共 180 大元。但是因為潘長發「無力清還」，而與眾番商定將雙藔社業戶諭戳「交換與」劉廷璧，日後業戶名下的租穀與正供，就由劉廷璧「前去收租掌管，

²⁹ 地方官府會藉由給戳、換戳、驗戳等名目，向番社索取陋規費銀。乾隆 56（1791）年、嘉慶 15（1810）年都有官員提出改正此弊端，但無何成效。詳可參閱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 429-431。

認納錢糧正供。」此外，契約中並沒有載明償還年限，而是約定交給劉「歷年前去收租掌管」。至於以往由番業戶租穀支應的社內各項需費，則「交與土目設法」，似乎是改由土目租穀支應或是另外設法籌款之意。

此契約雖然名之以「甘願約字」，但是劉廷璧已說明此為胎借。³⁰由此，既然番業戶的諭戳已經交給劉廷璧為質，地租將由劉管收，正供也由劉交納，劉廷璧已經擁有此份番租的完整權利。有意思的是，番業戶當初是因為乏銀領取諭戳，而向漢人胎借銀兩，但是番業戶又是用諭戳為抵押。³¹易言之，番業戶一領到諭戳，還沒收租，即交給漢人。這份租業雖然仍被稱為「番租」，但實際收益已經歸漢人所有。

綜合此案以上之梗概，是雙藔社番業戶先控告漢人小租戶與現耕佃人共謀抗納番租，致使漢人管事無租可收；而後佃戶與現耕佃人言其番租已經繳納，此係番業戶誣捏之詞。最終由公親出面調解，並且說明誤會起因是過去番業戶委託他人收取番租，而後番租胎借給漢人管事，轉由漢人管事負責收租，佃戶等因不知情而將租繳給舊的收租人。雙方最後在公親的調處下和解息訟。

然而在番業戶將其名下租穀胎借給漢人後，雙藔社的收入減少了業戶租穀一項，面臨更為拮据的窘況。原本即因缺乏公項銀辦理事務，而將其中一種公項收入一番業戶租穀一胎借給漢人，以公項收入胎借公項，如此挖東牆補西牆的方式，自然造成公費的缺額愈來愈多。於是眾社番又於隔年（光緒 9 年）以社內公租為抵押物，再向劉廷璧（即以下契約中的劉振順）借出 20 大元。其契字抄白如下：³²

全立借銀字。大甲雙藔社番業戶潘長發、土目潘義春、耆番
潘阿順、屯目潘德秀、潘成貴，全眾屯丁等，有社內年應得公租

³⁰ 《淡新檔案》，檔號：17207-23。

³¹ 關於社職人員將諭戳交付漢人管事前往收租抵利，進而所引發雙方之權益關係，可參閱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 400。

³² 《淡新檔案》，檔號：17207-25。

穀。今因社內缺項公費時集議，願將社內應得公租全向劉振順手內借出佛銀貳十大圓正足訖。全中言定，每元每月願貼利息加三行利；如有至期，備銀母利清還；如是無銀可還，願將社內公租至六月早季照數結穀，收抵清還，不敢母利有些拖欠。眾等不能異言生端滋事。此係仁義交關，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全立借銀字壹紙，付執為炤。

即日批明：全中親收到劉振順號佛銀貳十元正完足。再炤。

代筆人 邱香芝

為中人 陳文德 黃葉

在場番 潘德秀（戳記）

潘阿順（花號）

潘成貴（戳記）

光緒玖年拾貳月 日

全立借銀字

番業戶 潘長發（花押）

土目 潘義春（花押）

（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次潘長發等人是以「社內年應得公租穀」為抵押，向劉振順（即劉廷璧）借入 20 大元。雙方約定每個月利息三分，若期限屆滿時無清還母銀、利息，將以明年早季的社租抵償，但是契約中並無說明期限到何時，也無寫明是以何者名下的公租穀為抵押。但可以確定的是，有愈來愈多的雙藔社番社租穀落入漢人管事手中。

在這個案件中，可以發現雙藔社的番業戶因為缺乏銀兩支付領取諭戳告示之需費，也無力繳納正供錢糧，而向漢人銀主告借，將番業戶諭戳胎借給漢人銀主，由漢人向佃人收取番租，抵償債務。然而因原本已缺乏公費，之後又缺少了番業戶租穀的收入，番社公費更為不足，致使往後連其他的番社公租也一併被抵押借銀。這樣的情形在當時並非個案，在此案進

行中，日南社業戶劉烏瑞等人的呈詞裡，當談到潘長發以番業戶戳記向漢人借銀的情況時，其言「此亦各社帶借漢戶常情，卻無他異」。³³可見番社社職人員以番社公租作抵押，向漢人借入現銀的情形相當普遍。如此，雙藔社的番業戶租穀與番社公租都由漢人管事收取，社番無法由這些番租中獲取實際利益，造成番租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的結果。

再深究之，此番業戶租穀出胎的起因，係番業戶無力負擔領取業戶戳記時，必須繳納給官衙的陋規需費。可見地方政府對番社的需索確實成為社租的一大負擔，番業戶必須出胎租穀，才可應付之。

叁、社職人員之侵盜

番社中設置許多社職人員，如通事、土目、番業戶、管事等處理番社事務與番社社租。然而這些社職人員卻往往發生瀆職的問題，侵盜番社公有租穀或土地，致使番社收入減損，番社事務難以推行，熟番生計受到影響。以下舉四件《淡新檔案》之案件為例說明之。

一、管事侵吞租穀

在此先說明「管事」一職在番社中的角色。番社之管事也稱「包辦」，根據伊能嘉矩的記載，淡水廳於道光初年始有番社由漢人包辦番租的徵收。³⁴這是由於番民窮困，多向漢人借入銀錢，而以番社租穀抵債，社租遂由漢人管事（即包辦）向佃人徵收，扣除債務本息後，若有餘穀，再交給番社使用。³⁵漢人以債權人的身分介入並負責番租的收發，弊端也因此而生。以下將在 17409 與 17212 兩個案件中，說明漢人管事對於社租收理

³³ 《淡新檔案》，檔號：17207-33。

³⁴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誌（下卷）》（東京：刀江書院，1928 年），頁 696-697。

³⁵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 398-401。

的介入與影響。

(一) 17409 案

咸豐年間，大甲德化社之新、舊「總業戶」相互控告對方搶收、侵吞番社租穀。³⁶這是由於番社之社職人員的設置與職權沒有統一的定制，因此導致的糾紛。在這個案件中，各項番租、社務的職責歸屬問題成為雙方爭執的焦點。其發展過程頗為繁複，在此僅略述，而著重案末發生的案外案，代替番業戶收取番租的漢人管事還發生了侵吞番租的弊端，致使官府下令禁止此管事收租，並且拘傳到案審訊。

咸豐 8(1858)年 3 月 21 日，淡水廳轄下的大甲德化社總通事潘再興、屯外委劉文彩和差役等，³⁷共同向淡水廳同知恩煜控訴原番社業戶巧萬珍與管事陳瓶兩人共同侵吞眾番口糧；巧萬珍被斥革後，已由巧苑成接任新的總業戶。³⁸然而巧萬珍投稟言其年清年款，毫無拖欠；此係衙門差役等串謀舞弊，捏名巧苑成篡充總業戶。³⁹其後雙方不斷控訴對方，潘再興、巧苑成的這一方，將事關屯番制度運作的養贍租發放問題拉入此案中，擴大問題的嚴重性；指稱巧萬珍承接業戶後侵吞大租數千石，而這份番租是來自屯番制度下撥給的，並且違反番業禁令，將租業典借給德政祠首事鄭

³⁶ 戴炎輝對於業戶之研究概括的指出，番社業戶可分為「正供業戶」與「口糧業戶」。一般而言，正供業戶主要負責由所收社租中繳納正供，口糧業戶則是負責發給眾番口糧；但並非每個番社都有這兩種業戶，也不是一切番社都有設置業戶。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 394-396。

³⁷ 「屯外委」係屯弁之一，大小各屯每處皆設屯外委一員，與屯千總、把總統率分管屯丁。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之奏：「查熟番挑設屯丁，經將軍公臣福等仿照四川屯練兵丁之例，奏准於每屯各設外委一員專管，並設屯把總四員分轄，又於南、北兩路額設屯千總二員統率。」可知屯外委應是負責監督約束之務。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案彙錄甲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3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3-4。

³⁸ 《淡新檔案》，檔號：17409-4。

³⁹ 《淡新檔案》，檔號：17409-8。

人俊。⁴⁰

其後，淡水廳同知恩煜於咸豐 8 年 10 月傳集相關人等覆訊。前業戶巧萬珍解釋咸豐 6（1856）年 7 月時，其任職總業戶，因為穀價低廉，發完社番口糧後，所餘不敷呈繳公項，於是將業戶諭戳交給鄭人俊（德政祠），向鄭借銀 1,100 圓以完繳公項，約定由鄭收租 2 年抵還借項。⁴¹恩煜接受了巧萬珍的供詞，認為其並無疏失；同時判定巧苑成篡充總番業戶，業戶一職復歸巧萬珍承充，並發布諭示公告。⁴²由此也可見地方官員接受社職人員以番社租穀為抵押，向漢人借貸現銀以應急。

然而協助收取這份番業戶租穀的管事，卻於日後發生侵吞之弊。同治 2（1863）年 10 月，巧萬珍搬居埔裏社居住，收取番租之事務遂由德政祠管事陳友山負責。⁴³新任的淡水廳同知鄭元杰認為德政祠管事有侵吞之弊，因此示諭大甲西社佃戶總董等，該社業戶巧萬珍遷居埔裡社，無人承擔相關社租事務；故飭令將租穀暫行封貯，並僉舉適當人選接充業戶。⁴⁴同治 5（1866）年 5 月，接任的淡水廳同知王鏞也禁止德政祠管收番租，而是派職員督收。⁴⁵而後德政祠要求將督收租穀的職員調回，由其負責收發

⁴⁰ 《淡新檔案》，檔號：17409-57、58。乾隆 53（1788）年，閩浙總督福康安提出的屯番制度，以「近山埔地」作為屯番自耕養贍之地，並且嚴禁「私行典賣」。乾隆 55（1790）年臺灣府知府楊廷理、泉州府知府徐夢麟等再作修訂，養贍埔地距離屯所過遠者，准許其招佃耕作，不強迫屯丁親赴開墾。此禁令至光緒 15（1889）年在臺灣知府程起鶚的建議下，正式廢止，開放自由買賣交易。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奏疏選彙》，臺灣文獻叢刊第 2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 年），頁 52-53；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案彙錄甲集》，頁 20-21、37-38；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私法物權編》，頁 363-365。

⁴¹ 《淡新檔案》，檔號：17409-44、45、55。

⁴² 《淡新檔案》，檔號：17409-55、67。

⁴³ 德政祠管事陳友山言稱巧萬珍奉母之命，前往埔里，探視親屬，不久將回。但是依其後淡水廳同知王鏞的批詞，可知巧萬珍已身故多年，德政祠協辦代收番租而侵吞之。

《淡新檔案》：17409-107、110、118。

⁴⁴ 《淡新檔案》，檔號：17409-110～112。

⁴⁵ 《淡新檔案》，檔號：17409-115。

即可。⁴⁶但是王鏞調查後發現，其實巧萬珍已經身故，德政祠乃係劣紳刁棍把持，藉著收取番租的名義分吞租穀。

查巧萬珍身故年久，眾所共知。其德政祠名色不過虛立，並無其人。中間一、二劣紳刁棍，藉此派租每年數百石，朋收分吞。以朝廷贍番之糧，豈為爾等肥家之計。⁴⁷

王鏞說明他派員督收番租是為了「清租項而肅屯政」，可見此租業確實為屯番制之下的養贍地租穀。王鏞希望德政祠管事等就此打住，不要再提出收理租穀的要求，而侵吞番租之事可不追究，望其好自為之。⁴⁸

然而番租被漢人管事侵吞的熟番自然不會作罷，屯目巧玉成等人再度投稟，說明這片土地的來由：

叨盟皇恩厚愛，設立五社屯丁三百名，以防有事調遣。我社番屢有防堵徵勦之功，乃蒙皇仁體卹獎賞，暨列獻仁慈憐惜屯番忠心向義，勤勞效力，使蒙按地配租，設立各社通土業戶，管收大租。上完供課，下給社例口食等款。……罔料日久弊升，屯番疊受漢人苛剝，番黎屢次顛覆。暨被漢人包扶租穀，盡被收吞。社例口食，顆粒莫給，致社番飢寒流離，慘難盛言。詎擬犯陳二良、紳棍鄭人俊等朋謀，包扶巧萬珍為業戶，霸收社租，習慣成性，欺凌社番孱弱。膽敢局謀，紳衿朋比為奸，偽造借字，藉稱社番全巧萬珍向德政祠借銀千餘員，每年貼利谷二百石，擅割私戳，監收大租，以圖永遠佔收地步。不思番、漢不相交涉，例禁森嚴，憲示煌煌。⁴⁹（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片土地原本是屯番制度下撥給熟番的養贍埔地，依當時奏准的規定，雖然養贍埔地是撥給屯番自耕，但是距離過遠者可以交給漢人耕種，

⁴⁶ 《淡新檔案》，檔號：17409-118。

⁴⁷ 《淡新檔案》，檔號：17409-118。

⁴⁸ 《淡新檔案》，檔號：17409-118。

⁴⁹ 《淡新檔案》，檔號：17409-121。

再收取番租；而此養贍租一向是禁止以任何形式交易的，包括買賣、出典與胎借，直到光緒 15 年才開放自由買賣，也因此屯目巧玉成等言其「例禁森嚴」。但是漢人管事鄭人俊等侵吞租穀，使屯番的生計大受影響。而且在巧萬珍身故之後，「鄭人俊等復敢遍貼告白，藉稱德政祠銀項，四處擋租。」⁵⁰這讓原本不再追究的淡水廳同知王鏞認為其不可原諒，批示立刻拘傳鄭人俊應訊究辦。⁵¹

以上案例中的番社租穀在收發過程中，發生許多問題與弊端。首先，此案的大甲德化社總番業戶與前述的 17207 與 17212 兩個案件中的情況相似，社職人員都因為缺乏現銀辦理公務，而將番社租穀抵押給漢人管事，借貸現銀。可見以社租抵押借銀，致使社租落入漢人手中的情形相當常見。而且即使為法令所嚴禁的屯番養贍租業，地方官員也能接受，不判其為違法，也可見到中央政令與地方執行兩者之間的差距。再者，介於總業戶與漢佃之間協助收理番租的德政祠管事，確實有侵吞養贍租之情事；地方官員遂禁止漢佃對管事繳納租穀，由官派職員負責監督收租。可見番社租穀的管收事務由於漢人管事之介入，而產生被侵吞私分的問題。

總括而言，雖有一定數額的番社租穀歸於番社名下，且有制度化的社職人員負責掌理；但是整個番租收發的運作過程中，往往弊害叢生，造成番租在嘉惠熟番的功能上大打折扣。因此，番租於帳面上的留存數額，不一定能代表其所能產生的實質效益。而漢人管事介入番社租穀的收發所造成之影響與問題，也可見於以下的 17212 案件中。

(二) 17212 案

光緒 14（1888）年，正值臺灣巡撫劉銘傳推動番社改革，甫上任的竹塹屯總董事解大賓、日北屯總董事潘德順懇請新竹知縣方祖蔭追回原通事、土目的戳記，並暫時封收番租，待其正式掌理租穀後，再行收發。此

⁵⁰ 《淡新檔案》，檔號：17409-121。

⁵¹ 《淡新檔案》，檔號：17409-121。

乃因協辦收取租穀的漢人管事（亦稱「包辦」）有侵吞租穀之弊。⁵²解大賓、潘德順共同稟稱：

後壠社業戶李吉祥、管事佃首安禮，中港社業戶夏日長、管事劉秉先，新港社業戶劉文慶即劉己、管事劉英，貓閣社業戶和成、管事鄭理記，雙藔社業戶潘長發、管事劉廷璧，大甲東社業戶東福春、管事陳濬芝，日北社口糧業戶潘義益、管事鹿廳差役黃玖共柒社，暨各社眾番業戶係各社自報升科之公業戶，非同民業戶自成一家者。遙溯賓（解大賓）等祖先各社聯絡把隘，豈披荊斬棘，常多履險蹈危，責成頗效。故賜界外荒埔招墾配租，體卹服勞。其管事嗣後所請幫辦之人，因番愚直，漸敢覬覦包辦掌戳，致成一痼弊，其寔底裏全無轆轤。且業戶專責繳供，今改小租戶完納，則業戶應屬閒缺；原掌之租乃係公租，併無變賣與人，該租當封則封，雖或紛爭，亦同無謂。⁵³（底線為筆者所加）

據其所言，番業戶是各個番社的公業戶，掌理公有租業，與一般私有性質的民業戶不同。而這些租業是來自官府「界外荒埔招墾配租」，應是乾隆中期與後期清廷設置隘寮、屯所時，撥給熟番招佃收租的埔地。解大賓等指出劉銘傳推行「減四留六」的土地改革措施後，正供改由承墾的小租戶完納，番業戶已屬閒缺。他擔心的是請來包辦收租的管事因為握有戳記，而有混收番租的可能，因此懇請方祖蔭下令暫時封存番租。⁵⁴

之後潘、解兩人又各自投稟，更為詳細的說明這個問題。潘德順具呈通事、土目裁撤之後，番業戶名下仍有番租，由管事掌理，番業戶之租業因而有被漢人管事侵吞的問題，故懇請方祖蔭將德化社口糧業戶、大甲東社正供業戶及口糧業戶、日北社口糧業戶等四名番業戶名下的番租額暫時

⁵² 漢人管事即包辦，詳可參閱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396-401。

⁵³ 《淡新檔案》，檔號：17212-19。

⁵⁴ 《淡新檔案》，檔號：17212-19、20。

封收，不准包辦經手，歸由新頭目管理收發。⁵⁵解大賓的稟文更直接指出漢人認為番業戶名下之租業「奇貨可居」，於是謀職管事，掌管戳記，番業戶所轄之各社公業遂「盡係漢人管事包辦，吸番膏髓」。⁵⁶致使「戳則歸番名，租歸管事。丁糧雖發，侵尅殆盡」。⁵⁷由此可見，雖然官方發現通事、土目二職對於番地租業的弊多於利而裁汰，改以董事、頭目任之，但是番業戶之設置並未廢止，故仍有弊端；番業戶名下的租穀依然有被管事侵吞的問題，致使番丁生計困苦。

又依據方祖蔭對其稟文的批示，可發現漢人管事得掌戳記、收取番租的方式：

此次議改番租章程，因通、土包攬有弊，改充董事、頭目接辦。所有包收番租仍照民業留田（四）收六。秉公開銷盈餘之谷，分別歸公，或作香燈之用，據寔稟覆辦理。從前包辦漢人有成本在內，尚須分作七年勻還。此外由番賣給立契管業，配完正供，與民業無異，自未便奪為公業。⁵⁸（底線筆者所加）

由上述可知，漢人認為收取番租有利可圖，而投下「成本」，獲得包收番租的權利。但也因此產生扣尅侵吞之弊，致使解大賓、潘德順等接連請求方祖蔭在職責完全移交之前，暫行封收租穀。由此可見，漢人管事對於社租收發的介入極深，故有「戳則歸番名，租歸管事」的情況。此與前述番社租穀被胎借、出典的案例相似，番租雖在番人名下，但實際上由漢人收取，而有「名」不符「實」的問題。

二、管事與通事合謀侵吞租穀（17210 案）

⁵⁵ 《淡新檔案》，檔號：17212-46。

⁵⁶ 《淡新檔案》，檔號：17212-51。

⁵⁷ 《淡新檔案》，檔號：17212-47。

⁵⁸ 《淡新檔案》，檔號：17212-46。

17210 一案則是土日向縣官控告番社公租被管事與通事侵吞，致使社番口糧無措的案例。光緒 12（1886）年 8 月，新竹縣轄下的吞霄社土目潘春旺等向新竹知縣方祖蔭稟稱其社有公租穀 1,350 石，除撥給義學上下社費、社職人員辛勞穀、春秋祭祀費用以外，仍有租穀 750 石，歷年皆均分給番丁。但管事郭合串同郭鏡清、通事莫張來將應均分的 750 石的社租穀全數侵吞。⁵⁹被控告的莫張來和郭鏡清隨後也投稟說明案情。莫張來稱該社公租原本由通事收發，有富豪郭合、生員郭鏡清向其面議包收現年租穀；莫張來認為他們兩人一是富豪，一是紳衿，可以信賴，於是將通事戳諭交給他們，由其負責收租。但是郭合等人竟然將社租吞收，以致莫張來無租可發，而被眾番控告。郭鏡清則言有歹番潘德源向他索求不遂，於是冒捏通土與眾番之名誣陷他。⁶⁰

新竹縣知縣方祖蔭受理此案後，派遣差役前往查明實情。根據差役的稟覆，郭合等確實包收吞霄社租穀 1,350 石，而侵吞了 700 餘石未發。⁶¹被吞租谷的項目為：眾番口糧 500 餘石、義學穀 30 石、土官穀 30 石、築壘穀 10 石、春秋祭祀穀 30 石、功勞穀 70 石、作田雜費穀 50 石，共計 700 餘石。⁶²又繳納這份吞霄社大租的佃人黃奎、黃阿香、古阿敬、洪輝等呈稱，其應繳之租已經被郭合等收去、侵吞，郭被追討番租後，反而藉通事之名誣指稱佃人抗納田租，以致無租可發。⁶³黃奎等並附上八紙已納該年份通事大租之租單為憑證。⁶⁴

另有已革土目潘春旺稟稱通事莫張來並無其人，而是郭合私自設置之兩名通事莫新來、張天喜所合成的虛名。⁶⁵然此案後來移交給中路撫民理

⁵⁹ 《淡新檔案》，檔號：17210-1、3。

⁶⁰ 《淡新檔案》，檔號：17210-9。

⁶¹ 《淡新檔案》，檔號：17210-6。

⁶² 《淡新檔案》，檔號：17210-8。

⁶³ 《淡新檔案》，檔號：17210-14、16。

⁶⁴ 《淡新檔案》，檔號：17210-17~24。

⁶⁵ 《淡新檔案》，檔號：17210-25。

番同知張星鶚繼續審辦，因此未能瞭解後續的發展情形。⁶⁶但至此我們已可見到漢人管事包收番社租穀確實會發生番租被其侵吞的問題，使眾番口糧無措，番社事務也無法推動，熟番生計為此更為困苦。如此的現象，於前文之 17409 案與 17212 案都可見到。總此，漢人管事侵吞租穀對於社租收益所造成的威脅，可謂相當嚴重。

在分析了番業戶、通事、管事等社職人員與番社租穀的相關案例後，下文將介紹另一重要社職人員—土目，觀察其所掌管的番社租穀以及可能發生的問題。

三、土目侵盜番社公業（17205 案）

番社中土目的設置源於荷蘭統治時期之「土官」，明鄭時期延續此制，協助官府約束番眾並處理社務。⁶⁷清治臺灣後也設置土官，至乾隆 4（1739）年時開始改稱「土目」，乾隆 13（1748）年後成為普遍的名稱。⁶⁸土目除了負責一般社務的執行之外，也掌理部分番社租穀的徵收與支用。

透過以下 17205 案例的分析，可以明瞭土目失職對番社租穀與眾番生計造成的衝擊。此案中，後壠新港社眾番聯合控告土目盜典公租、盜賣口糧，而且未經過眾番同意，即私自將番社公埔賣給漢人，影響社番權益，致使眾番赴軒呈控。經過縣官的裁決，土目與漢人私立的買賣番地契約當堂抹銷，但是由於土目拒不將侵吞的公租繳出，而被官府押管。

光緒 5（1879）年 11 月 12 日，新竹縣竹南二保後壠新港社生員陳實華、前通事劉拔超稟告，解潘鍾（一作解潘鍾）充任土目之後，每年侵吞公租口糧 156 石，至今已 5 年，未曾按丁發給口糧。⁶⁹光緒 4（1878）年，

⁶⁶ 《淡新檔案》，檔號：17210-11。

⁶⁷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168。

⁶⁸ 參閱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 371-379。

⁶⁹ 《淡新檔案》，檔號：17205-1。

中路撫民理番同知陳星聚飭令由副通事林洽和所收的番租中，每年分撥給新港社口糧 203 石。但此口糧又被解潘鐘盜領，二年共被領去 406 石。光緒 5 年 10 月，解潘鐘還將先祖遺下給社眾耕種、樵牧的兩處公埔—塩菜甕、火炭塢—私賣給張石養（一作張石揚）。此外，尚有許多屯丁、番眾也接連呈控解潘鐘之違法失職。⁷⁰

在被控告盜買番社公埔後，張石養也具狀說明此公埔買賣的經過，以證明其所有權。嘉慶年間，土目琳武力等將燒炭窩山業給出予張石養之父張禮禎永耕。張禮禎建隘防範生番數十年之久，番民才得以安心耕種、樵採。光緒 4 年，土目解潘鐘為了興建義塾，向張石養找賣 80 圓，張備銀立墾，將契投稅。但陳實華、劉拔超卻誣控其霸佔田業。⁷¹

為了進一步瞭解案情，新竹縣知縣李郁階於光緒 5 年 12 月 9 日傳集所有相關人等，當堂審訊。⁷²據前通事劉拔超供稱他退辦通事後，由林合和充任；而這份通事租穀共有 400 餘石，支出項目包括：1.撥出 100 石貼送鹿港班頭；2.撥 45 石貼送卯費；3.撥 32 石貼付站書辛勞；4.撥 100 石貼與副通事；5.剩餘 203 石作為屯丁口糧。陳實華供稱當中 203 石的租谷係前理番同知陳星聚下令給與屯丁作口糧，而被土目解潘鐘侵吞。

但是解潘鐘的供詞卻與劉拔超大相逕庭。解潘鐘供稱劉拔超任職通事時，收取社租 600 餘石而不發給眾番口糧，被告准斥革。接任的林合和仍然不發口糧。解潘鐘因此與眾番決定控告林合和，並同立合約字，約定除了開告費用以外，所爭回的租穀由眾番均分。之後經洪秀才等調處，僅向林合和收 80 石。⁷³又，解潘鐘自行從辛勞穀中抽出 30 石興蓋學堂，因費用不足而將一公埔找賣給張石養。他供稱：「這張石養所買田業，係前手寫出永耕字給與張石養耕作，有四、五十年，無可升租，猶如出賣。小的故

⁷⁰ 《淡新檔案》，檔號：17205-2~13。

⁷¹ 《淡新檔案》，檔號：17205-18。

⁷² 《淡新檔案》，檔號：17205-24。

⁷³ 「蔴踏頭」亦稱「蔴踏」，係為通事、土目的聽差，協助差傳公事。詳可參閱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 403-404。

敢找賣，抵作起蓋學堂。」⁷⁴解潘鐘指出這塊埔地既給出永耕，又無帶納番租，實際上已經形同杜賣，才敢將其找賣，以所得興蓋學堂。張石養也供稱這田業是先人向新港社番給墾的：「去年因要起蓋學堂，即欲起耕，小的固有向伊承買。現有字據呈核。」

面對知縣李郁階審問時，解潘鐘又稱他將此番社公埔賣給張石養之際，曾邀眾番共同立契。⁷⁵但李郁階在審查張石養當堂繳驗之印契後，指出「並無眾番在場立契，其為私相授受無疑」。李郁階認為這片埔地既然是公埔，買賣應該經過眾番同意，由於沒有眾番在場立契之證明，故此為解、張兩人私相授受，遂屬無效，此契約應當堂塗銷。而解潘鐘也表示悔過，願意備齊贖銀還給張石養，以抹銷此次之私賣。李郁階諭令將契字批銷，交給陳實華收執，以備日後查核。

然而此案尚未完結。光緒 6（1880）年 6 月，陳實華再度控告解潘鐘盜典光緒 6 年之公租，並且串謀佃人抗納租穀。⁷⁶同年 6 月 23 日，繼任的新竹知縣施錫衛再次提集相關人等進行覆訊；施指出雙方繳驗的帳目轆轤不清，且之前飭令解潘鐘將欠繳的番租酌量歸還（補給眾番口糧穀價銀 412 元 5 角⁷⁷），但解潘鐘尚未繳納，因此下令將解潘鐘交差押管。⁷⁸

而陳實華等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於光緒 6（1880）年 8 月再次投稟懇請知縣施錫衛出示曉諭，同時也說明燒炭窩（火炭塢）、塩菜甕兩地過去的買賣經過。這兩塊地原本於同治 11（1872）年，經過社眾同意，將地招得張阿文兄弟開墾，以 15 年為期限。⁷⁹但是解潘鐘將此地盜賣給張阿文之弟張石養（一作張袞榮），經過前知縣李郁階提訊，將此買賣地契塗銷。而後張石養托公親向眾番懇求將以前所立之承墾耕字再批明：若未在 15 年的期

⁷⁴ 《淡新檔案》，檔號：17205-24。

⁷⁵ 《淡新檔案》，檔號：17205-23。

⁷⁶ 《淡新檔案》，檔號：17205-32。

⁷⁷ 《淡新檔案》，檔號：17205-45。

⁷⁸ 《淡新檔案》，檔號：17205-36。

⁷⁹ 《淡新檔案》，檔號：17205-46。

限之內開闢成田，酌議將地陞租起耕。陳實華等為此懇請施錫衛出示曉諭，以禁絕盜賣之事；其稟文後並附有贖約字，且批明全案之原委，茲摘錄如下：⁸⁰

立承耕字人張阿文等。情因向新港社番土目英仕香、番差鐘合歡、鐘書錦、劉安義仝眾番等贖出山埔一所，土名南窩燒炭窩、北窩鹹菜甕，一連兩窩。東至雞油崗倒水為界，西至統櫃崗頂倒水為界，南至北坑崗頂為界，北至興化林崗頂為界。四至界止踏明。茲眾社番欠公本開闢成業，願將此山埔一所招得漢人張阿文等備出花紅佛銀壹拾六元正，足訖交付香等開發所費。其山埔踏明，交付銀主前去自備工本。即日仝中三面言定，歷年配納園租銀六大元正；至十五年以後，應納園租銀四大元正。其埔地至十五年後，有成田業者，壹拾石之田應納大租穀壹石五斗。十五年以後，倘未開成田業者，願將交還社人等起耕招佃，文不敢刁難茲事。此係二比兩願，兩無迫勒。口恐無憑，立贖耕字兩紙，各執一紙，併照。

即日批明：備出永耕撰字內佛銀拾大元正足訖。付照。

又批明：社番人等前來樵採其佃人不能阻擋。立批。

代筆人 楊榮芳（花押）

為中人認耕 張禮錦（花押）

在場人 朱阿龍（花押）

大清同治壬申拾壹年捌月 日 立承耕□字人 張阿文（花押）

光緒陸年四月間批明字內公業係後墘新港社應額。因先年經立永耕字十五年為限與張家，後被解潘鐘私相盜賣，立契投稅等情。致社眾赴李縣主具控，堂訊查出盜賣情真，將張家買契註銷

⁸⁰ 《淡新檔案》，檔號：17205-47。

在案；斷令仍照英仕香立永耕十五年限滿後，有成田、未成田，兩比邀同酌議或陞租、或起耕，各不得刁滋事，立批是寔。

代筆 張袞榮（花押）

在此案件中，後壠新港社由土目負責管理的番社田業，由於土目自身的違法失職而導致番租被侵吞，番地被盜賣、盜典，番社地權受到相當的威脅和破壞。此外，從《淡新檔案》中的 17101、17102 兩案也可說明土目侵吞口糧的情形。17101 案是道光 16（1836）年 10 月鹿港海防捕盜同知陳盛韶移文至北路淡房總捕分府婁雲，文中敘述壠中新猫四社總通事吳金水、副通事潘長和等僉稱中港社原土目胡得生因為侵吞口糧被示革，而另推舉社番劉紀年為新任土目，請求驗明給予充任之事。⁸¹17102 案則為道光 20（1840）年 5 月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捕盜同知張汝敦移知臺灣府淡水撫民同知劉繼祖的移文，因中港社番耆番來生什班等呈稱中港社土目劉紀年串同副通事侵吞糧埔，經控告而被斥革，眾番再推舉社番林必達充任土目。⁸²雖然這兩個案子皆僅有一件移文，但可以見到中港社土目私吞社租之事接連發生，原土目胡得生因此被革去，接任的土目劉紀年也為此被示革。由此，17205 案之新港社土目解潘鐘侵盜番社公業並非單一個案，土目的失職貪瀆乃時有所聞，且對熟番生計造成嚴重的傷害。

⁸¹ 《淡新檔案》，檔號：17101-1。

⁸² 《淡新檔案》，檔號：17102-1。

肆、番社租穀的收支與地方官府之朋分 (17212 案)

除了收發過程中的相關問題之外，番社租穀的收支項目也是值得關注的部分。由 17212 案的分析，可以瞭解光緒 14（1888）年之番社改革前，番社租穀的支用項目中，原本即有支付差役、書吏等之陋規需索。⁸³番社改革之後，雖然刪裁了以往社租需要支付的衙門陋規，但是卻增加「繳縣稟撥公用穀」一項；其規定必須將一部分的番租撥出繳縣，以為公用，使番社租穀依然受到地方官府的剝削。

前已述及，光緒 14（1888）年劉銘傳下令各廳縣比照淡水廳知縣汪興禕的議請方式，辦理番社之改革事宜。光緒 14 年 11 月 21 日，新竹縣知縣方祖蔭諭飭潘德秀、解大賓等，下令頭目、董事分收的各屯社番租穀照冊分發口糧、薪工後，尚餘租穀應繳交縣衙，作為公款。⁸⁴由於此時番社租穀已經因為「減四留六」的新措施減少了四成的番租收入，⁸⁵如今又必須將社租餘款繳縣充公，此對於已經入不敷出的社租無疑是雪上加霜，故潘、

⁸³ 關於地方官府與陋規的關係，可參閱 T'ung-tsu Ch'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2-32. 另有中譯本：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譯：《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頁 40-57。

⁸⁴ 《淡新檔案》，檔號：17212-74。

⁸⁵ 光緒 14（1888）年 5 月劉銘傳出示曉諭，公布施行大租「減四留六」的措施，將小租戶原本須繳納給大租戶之大租原額減去四成，日後由小租戶完那正供錢糧，大租戶不須再納正供。而番業戶之大租、番丁私口糧、屯番的養贍租等各類型的租穀也都一律採行此制。由於一般漢人業戶與番業戶本須繳納正供，因此雖然少了四成的大租收入，卻因不必再納正供而得到平衡。但熟番自耕而轉贖之租，即社番的自耕口糧田業，以及屯番養贍埔地招佃收取之養贍租，此兩者原本就不必納正供，如今卻也被視為一般大租而減少了四成收入。這個政策對熟番而言，頓時使其減少了四成的租穀收入，卻無所補償。邵式柏與柯志明也分析了此問題，詳請參閱 John R.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 360-361;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307-309。

解等稟請蠲免之。⁸⁶光緒 15 (1889) 年 2 月 25 日，竹塹屯外委邵長發、竹日武屯把總潘運來、日北屯外委潘德秀也因「社務苦困」而稟稱：「今已裁租（減四留六），薪水公款原屬支絀，茲復刪減，困苦難口。」懇請將裁剩六成的番租蠲免繳款充縣。⁸⁷但是方祖蔭與臺北府知府雷其達都認為這是屯弁藉端拖延之辭，仍飭令其繳交。

同年 4 月 18 日，潘德順、解大賓與各社頭目再僉稟，說明番社事務運作上的窘迫：

前未升科完糧，且免繳款。今既奉准提出四成完糧之外，又
再加提公款，委寔困苦難堪。⁸⁸

而且此稟文還詳細列舉了番社面臨的實際難題：

1. 社中祭祀公費僅存六成，支絀難辦。
2. 以往各社皆有通事、土目協辦社務，如今只有頭目一人，薪俸僅 50 到 80 石，而且大小公事與屯丁出防換班日糧均由其薪水支給。
3. 各社公租由於戶口增加、裁存六成、給包辦兩成，僅餘四成，又扣除董事和頭目薪費後，每番口糧只有 1、2 石到 3、5 斗。

番社上下皆面臨著經濟問題，因此請求免去繳縣公款。但是雷其達認為「新竹於裁減並提漢人包辦原本之外，尚有剩餘，故即提充公用，該董事、頭目等前已領冊遵辦。現因屯弁攬稟，乃亦第希冀免，殊屬不合，著即遵照定章辦理，毋得多瀆」。⁸⁹地方官員認為番社租穀的剩餘租穀本來就應該提交官府充公，屯弁等是貪圖分肥而請求裁減繳縣公款，故仍飭令番社繳納充公穀。也因此仍可在之後呈繳的光緒 14 年番租收支清冊中，發現各社均編有「應繳縣稟撥公用穀」此一支出款項。

在番社改革過程中，為了釐清改革前、後各種名目下之番租的收支數

⁸⁶ 關於劉銘傳推動之「減四留六」土地改革政策對熟番地權所產生的影響，請參閱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307-308。

⁸⁷ 《淡新檔案》，檔號：17212-88。

⁸⁸ 《淡新檔案》，檔號：17212-101。

⁸⁹ 《淡新檔案》，檔號：17212-101。

額，各廳縣必須造送番社租穀的收支清冊，即「應收通土口糧租穀並應支應減各項用款數目四柱冊式」。因此新竹縣知縣方祖蔭也收取、整理了各番社租穀的收支清冊，上繳供作查核。其在每一番社的租穀下分列「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應裁各款」等五項，而「四柱」是指「應裁各款」以外之四項。各項內容之說明如下：

1. 「舊管」：清賦改革之前，所收取之社租穀數，尚未扣除減四留六之後要貼給小租戶的四成完糧穀。

2. 「新收」：指「舊管」所收之穀，在扣除貼給小租戶的四成租穀後，所實際收得之穀數。

3. 「開除」：核准「新收」之社租支出的項目。包括社職人員之辛金穀（新設之董事、頭目與屯目等）、公費穀、什用費、秀才穀、束脩穀、祭祀費穀、屯丁接應差事穀、社番口糧穀等。

4. 「實在」：支出後的剩餘租穀，即「新收」扣除「開除」後之餘。包括應繳縣稟撥公用穀、應存穀。

5. 「應裁各款」：係為以往支出項目，而於光緒 14 年改革後刪除者。包括舊社職人員辛金穀（裁撤之通事、土目與蔴踏等）、衙門陋規、部分正供銀、祭祀費穀。

透過這件資料中所記錄的收支數額，可以明瞭各番社租穀的實際支用情形，並可確實計算出熟番生計的部分於其中所占的比例，故筆者將方祖蔭上繳的番租收支清冊詳細開列如下，以供參考。

表 1：光緒 14 年竹塹社轄下各番社租穀收支表⁹⁰

收支項目	番社租穀	竹塹社通土口糧租穀	壠中新貓四社總通事租穀	壠中新貓四社副通事租穀	中港社土目、番差、甲首租穀	新港社土目、番差、甲首租穀	後壠社土目、番差、甲首、蘇踏頭租穀	貓閣社土目、番差、甲首、蘇踏頭租穀	吞霄社通土口糧租穀
舊管		946.31 石	852 石	195 石	411.93 石	260.54 石	199.37 石	528.86 石	1,679.7 石
新收		595.17 石	511.2 石	117 石	247.185 石	156.324 石	119.622 石	317.316 石	1,007.442 石
開除項目	辛金穀	150 石	80 石	10 石	111 石	86 石	78 石	88 石	170 石
	公費穀、什用費	38 石		20 石	35 石	30 石		30 石	40 石
	秀才穀、束脩穀	160 石	132 石	30 石 (義塾穀)					120 石
	祭祀費	71 石			22 石			46 石	89 石
	屯丁接應差事	18 石		20 石					30 石
	社番口糧穀		235.2 石					80 石	350 石
	其他		40 石 (補給中、新兩社租穀)						
	合計	437 石	447.2 石	84 石	168 石	116 石	78 石	244 石	790 石
實在	應繳縣公署撥用穀	68 石		15 石	36 斗	28 石	10 石	38 石	62 石
	應存穀	90.17 石		18 石	43.158 石	32.324 石	31.622 石	35.316 石	148.442 石
應裁各款	辛金穀	100 石		100 石	84 石	30 石	30 石	30 石	150 石
	衙門陋規	200 石		45 石	31 石, 4 元	44 石, 4 元	15 石, 4 元	48 石, 6 元	110 石, 4 元
	正供銀 (竹縣年完番丁銀)	38 元							105 元
	祭祀費				30 石 (內含六成安隘穀)	20 石 (內含六成安隘穀)	20 石 (內含六成安隘穀)	50 石	
	其他								番丁糧穀：20 石； 歸官支收民壯穀：90 石

⁹⁰ 整理自《淡新檔案》，檔號：17212-69-1～69-27。

(接前表)

番社租穀 收支項目		貓孟社土 目口糧租 穀	苑裡社通土 租穀口糧屯 租	房裡社通 土租穀	雙蔡西勢 社業戶租 穀	德化社總 通事租穀 口糧	大甲東社 副通事租 穀	日南社土 目租穀	雙蔡東勢社 土目租穀
舊管		269.86 石	1,293.57 石	497.4 石	476.56 石	890.51 石	304.39 石	666.8 石	225.58 石
新收		161.916 石	766.25 石	298.44 石	285.936 石	534.306 石	182.634 石	550.8 石	135.348 石
開除項目	辛金穀	30 石	349 石	66 石	90 石 (50 石為業 戶養贍穀)	150 石	54 石	76 石	44 石
	公費穀、 什用穀	15 石	30 石	24 石	24 石	40 石	14 石	30 石	
	秀才穀、 束脩穀	20 石	80 元	30 石	40 石	100 石	36 石	70 石	
	祭祀費 穀	20 石	64 石	56 石	20 石	78 石	39 石	59.2 石	6.4 石
	屯丁接 應差事 穀		20 石			20 石	8 石	10 石	
	社番口 糧穀	30 石		50 石	80 石			220 石	83.348 石
	其它							加給鰥寡 孤獨口糧 養贍穀： 10 石	
合計	125 石	640 石 (543 石, 80 元)	226 石	230 石	534.306 石	143 石	475.2 石	133.948 石	
定在	應繳縣 粟撥公用 穀	10 石	56 石	36 石	20 石	80 石	19 石	45 石	1.4 石
	應存穀	26.916 石	80.25 石	36.44 石	35.936 石	65.106 石	20.634 石	30.6 石	
應裁各款	辛金穀	16 石	26 石				80 石		
	衙門陋 規	8 石, 17 元	78 元	33 元, 12 石					
	正供銀	43.36 元 (竹縣年 完正供銀)	49 元 (竹縣完繳 正供銀)	88.524 元	80.64 元				
	祭祀費 穀		6 元			31 石	4 石 (文興 宮緣金穀)	60 石	60 石
	其它		竹縣完繳屯 租公項：2 81.52 石；竹 縣完繳番丁 錢糧銀：12 元		隘穀：5 石	過年應發 五社眾番 大塩公 費：20 石； 僧生員 育才穀：20 石			

以上列舉新竹知縣管轄下 15 個番社的番租穀，扣除水沖和佃戶抗納以外，總計收穀 9,697.93 石（即「舊管」之總和）。⁹¹又扣除提給小租戶四成完糧穀 3,726.078 石外，實收穀 6,016.862 石（即「新收」之總和）。

若依支出項目分類，光緒 14 年新竹縣轄下的番社租穀大致支付九類開支，以下列舉其類別、數額，以及占實收穀總數的比率。

- 1.社職人員辛金穀：1,632 石，約占 27.12 %。
- 2.公費穀：370 石，約占 6.15 %。
- 3.教育費穀（秀才穀、束脩穀）：818 石，約占 13.60 %。
- 4.祭祀費穀：570.6 石，約占 9.48 %。
- 5.屯丁接應差事穀：126 石，約占 2.09 %。
- 6.社番口糧穀：1,125.848 石，約占 18.71 %。
- 7.其他：50 石，約占 0.83 %。
- 8.應繳縣稟撥公用穀：524.4 石，約占 8.72 %。
- 9.應存穀：598.968 石，約占 9.95 %。⁹²

由此，番社租穀的支出項目中，社職人員辛金穀所占之比率最高，其次為社番口糧穀，再其次為教育費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上表中的「應裁各款」中，可發現光緒 14 年的番社改革刪裁了衙門陋規。在改革之前，即光緒 13 年，「舊管」之番社租穀是 9,697.93 石。而衙門陋規共計 513 石，又 129 元；若全部換算為穀，總和約 668.445 石，約占「舊管」的 6.82 %。⁹³而光緒 14 年以後雖裁去衙門陋規，卻又新增「應繳縣稟撥公用穀」一項，

⁹¹ 以上計有 15 個番社，因新竹竹南二保之壠中新貓四社分列為總通事租穀和副通事租穀，因此共計為 16 項。

⁹² 「應存穀」是用以歸還包辦番社租穀之漢人的本金，詳可參閱《淡新檔案》，檔號：17212-69-1～69-27。又，光緒 14 年的番社改革事項中規定：「今則裁減之後，尚有餘租，現擬每年酌提若干，給與從前包辦漢人收作原本，以 7 年為限，俾免藉口；限滿之後，即一律充公，提作各廟香燈之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436。

⁹³ 依李冕世、黃典權之研究，光緒 14（1888）年的穀價 1 斗約銅錢 100 文。依王世慶之研究，光緒 15（1889）年竹塹地區佛銀 1 元折銅錢 1,205 文（光緒 14 年之佛銀與銅錢

其總和為 524.4 石；而光緒 14 年的番租總收入是 6,016.862 石，約占「新收」的 8.72 %。

由此，可以發現在番社改革以前，地方官府透過陋規需索的方式，例如：陋規穀、戶房奏銷冊費銀、糧差辛工穀、差費穀、牛免穀等項目，瓜分部分的番社公有租穀。經過光緒 14 年的番社改革之後，這些陋規需索雖然已經被刪裁，皆已列入應裁款項，不需再繳納，然而卻又增加「應繳縣稟撥公用穀」一項，故地方官府對於番租的侵奪並沒有消失。換言之，改革之前，官府是透過非制度化的管道侵奪部分租穀；改革之後，則改以制度化管道持續分割番社租穀之收益，而且所占的比率較改革之前還大。就此角度而言，地方官府實非熟番地權的保護者，而是剝削者之一。此外，這也表示番社的公有租穀並非全然支應番社與熟番所需，其收入數額並不能全然代表熟番的收益，必須詳為分析收支項目才能明瞭其實際之運作與支用情形。

伍、結語

透過以上對《淡新檔案》案件的分析，可以明瞭番社租穀在番社、熟番與漢人之間的流動情形，以及實際的收支項目。番社將土地交給漢人墾耕後，從保留收取部分租穀的權利，到土地完全流入漢人手中，乃為一般之趨勢。而番社所擁有的番租類型，依照其歸屬於不同的社職人員名下，而有許多名目、類別；其中主要包括通事租穀、土目租穀、番業戶租穀，以及光緒 14 年改制之後的頭目租穀。通事租穀與土目租穀有時會合稱為「通土口糧租」，番業戶租穀又可分為由正供業戶和口糧業戶收管的兩種類

比價資料闕如)。故衙門陋規的 129 元當時約可折銅錢 155,445 文，約可購得穀 155.445 石。此數與 513 石共計為 668.445 石。李冕世、黃典權：〈清代臺灣物價之研究〉，《成功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報》，第 4 號（1977 年 7 月），頁 41-129；王世慶：〈十九世紀中後期臺灣北中部銀錢比價變動續探（1839-1895）〉，收於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八輯）》（臺北：中央研究院社科所，2002 年），頁 237-268。

型。然而並非每個番社都設有以上各類的社職人員，故各個番社的番租名目不盡相同。而且即使同名目的番租，在不同番社中也可能有不同的用途。因此，只有分析當時詳實記錄北臺之地方行政事務和司法案件的《淡新檔案》，才能明瞭各種不同名目番社租穀之徵收、發放與運用的實際過程，並從中觀察其所面臨的各種挑戰與變革。

各種名目的番租是否能如實嘉惠眾番，應為檢視熟番地權是否受到清廷政策完善保護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番社租穀的收發過程及其支用項目，係本文主要的觀察重點。首先，就番租的收發過程而言，負責收發番租的社職人員自身即可能違法失職，侵吞番租而不發口糧。其次，包辦收取番租的漢人管事對於番租收益的影響也至關重大。由於社務開支與官府需索過重，番社業戶往往因缺銀給付，而以社租為抵押，向漢人管事借貸銀兩。此類之「番租」雖有「番租」之名，仍被視為熟番名下的田業，但實際上已經成為漢人管收的租業，熟番並無收取番租的權利。此外，讓漢人管事掌管諭戡、擁有收租權，也易衍生許多弊害，前文即舉出不少管事侵吞番租的案例。

再者，分析番社租穀的支用項目，可見到官方朋分番社租穀。如 17212 案中新竹縣轄下 15 個番社租穀的收支清冊即顯示光緒 14 年番社改革前，番社必須繳交官衙的陋規需索；改革之後，僅有小部分的番社租穀用來支應熟番口糧。由是，社租並非全數撥給熟番，熟番未獲得這些番租的所有利益，故番社租穀並不能全然作為熟番權利與地權的代表。

最後，對社租產生威脅的除了社職人員、漢人管事與包辦之外，還包括了地方官府。由番租的收支清冊，即可明顯見到光緒 14 年番政改革前，番社必須由租穀中撥出一定的數額支應官衙的陋規需索；番政改革後，陋規雖已刪除，卻又必須繳納新增的繳縣充公穀，官方對於番社租穀的侵奪經過制度化而成為正式的規定。當時又正值推行「減四留六」的土地改革政策，許多無納正供的番地租業已頓失四成收入，加上新增的繳縣充公穀，對於原本捉襟見肘的社租無疑是雪上加霜。由此觀之，地方官府並非總是在番地問題上扮演保護者的角色，就其對番社租穀陋規需索與強制充公而

言，乃是在相當程度上侵奪了熟番的土地權益。

而邵式柏與柯志明的研究中，運用光緒年間的番租數額，作為熟番地權受到官方保護之推論的證據。邵式柏引用《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附錄的〈設改章程總冊〉中所記錄之光緒 14 年淡水縣管轄下各番社通事、土目口糧租穀的收入數額，認為這是熟番地權獲得保護而留存至清末的例證，故而推論清廷規劃的「番大租」制度維護了熟番對土地的權利，熟番生計獲得此番租收入的支持而沒有流離遷徙。柯志明則以《淡新檔案》與《土地申告書》中所記錄之番租的數額，重建了光緒 12 年間新竹地區的番租分布概況。根據他的研究顯示，所有的番租數額中，位於保留區內的番租數額遠多於土牛界內和隘墾區。柯志明以此推論，相對於土牛界內與隘墾區，清廷於乾隆 55 年以後，在保留區中對番地（租）採行有系統且一貫的保護政策；乾隆 33 年確立的番地保護法規，在乾隆 55 年以後全面普及於保留區。

以熟番地權留存的例證而言，邵式柏舉證的是番社的通事、土目口糧租穀，柯志明所統計的番租則包括熟番的私口糧租，以及通事、土目與番業戶等收取的番社租穀。依此標準，只要是被稱為「番租」的租業，都歸熟番所有，也就是熟番地權尚存的表徵。但是由本文所分析的案例中，可發現不少番業戶、通事、土目名下的番租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番社租穀的留存數據並不全然等同於熟番由番社租穀中所獲得的實際利益。不少番社租穀的收益者是漢人，而非番社。除了《淡新檔案》之外，目前出版眾多的古文書契約亦顯示了相似的問題；在不少契約中，可以見到熟番與漢人藉著出典、贖耕、招佃、給墾等名目，無約定墾耕期限，而將土地的實權永遠割賣給漢人，僅保留一些番租。不理會禁令直接違法交易的契約有之，變換名目、規避禁令以行交易的契約亦有之。甚者，連番租也不保留，契約內容就如同杜賣一般。由此，熟番地權不斷流向漢人社會的情形，實非政府禁令所能阻絕。⁹⁴熟番地權的相關利益在名義上雖然應屬

⁹⁴ 筆者曾對已出版之道卡斯族契約文書進行分析與統計，包括《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

於熟番所有，但在實際上卻往往為漢人所得。

由是，若未考量各種番社租穀實際的收取與支用情形，而將所有番租直接納入統計、分析解釋，將可能因忽略熟番地權之實質內涵，致使對於清廷番地政策的成效與評價有所偏失。換言之，必須詳為檢視各種番租的內涵，才可明瞭其與熟番權利的實際關聯，以及作為熟番地權之代表性如何。從而更為全面的探究熟番地權流向漢人社會之各項相關議題，並評估清廷對於熟番地權保護的實際成效。

集—竹塹社》、《道卡斯新港社古文書》、《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道卡斯族崩山八社與拍瀑拉族四社》、《道卡斯蓬山社群古文書》、《道卡斯後壠社群古文書》、《大甲東西社古文書》等六冊古文書彙編所收錄之與熟番地權相關的契字，從中發現道卡斯族人在乾隆末期以後，仍在西部平原地帶擁有一定的土地；此與過去研究認為的熟番地權在乾隆朝即流失殆盡的觀點有所不同。熟番地權從清治臺灣起就開始流向漢人社會，但是並非在乾隆朝就流失殆盡了。熟番地權的流失是一個持續不斷的現象，直至清末。參閱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年）；胡家瑜主編：《道卡斯新港社古文書》（臺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999年）；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道卡斯族崩山八社與拍瀑拉族四社（上、中、下冊）》（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陳水木、潘英海編著：《道卡斯蓬山社群古文書輯》（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2年）；陳水木、潘英海編著：《道卡斯後壠社群古文書輯》（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0年）；劉澤民編著：《大甲東西社古文書（上、下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年）；吳奇浩：〈清代臺灣之熟番地權—以道卡斯族為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淡新檔案》，微縮捲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17101，無案由。

17102，無案由。

17205，無案由。

17207，無案由。

17210，案由殘破不清。

17212，〈一件飭查明番社統計若干社是何社名應收番租若干據實稟覆由，並附舉充頭目各稟在內〉。

17409，無案由。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案彙錄甲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3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5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灣文獻叢刊第 15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19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奏疏選彙》，臺灣文獻叢刊第 2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 年。

(二)專書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誌》。東京：刀江書院，1928 年。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年。

洪麗完，《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道卡斯族崩山八社與拍瀑拉族四社（上、中、下冊）》。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

胡家瑜主編，《道卡斯新港社古文書》。臺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999年。

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年。

陳水木、潘英海編著，《道卡斯後壠社群古文書輯》。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2年。

陳水木、潘英海編著，《道卡斯蓬山社群古文書輯》。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2年。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二版。

劉澤民編著，《大甲東西社古文書（上、下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年。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

Ch' u, T' 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中譯本：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譯，《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Shepherd, John R.,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5.

(三)期刊論文

王世慶，〈十九世紀中後期臺灣北中部銀錢比價變動續探（1839-1895）〉，收於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八輯）》。臺北：中央研究院社科所，2002年。

吳奇浩，〈清代臺灣之熟番地權—以道卡斯族為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李冕世、黃典權，〈清代臺灣物價之研究〉，《成功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報》，第4號（1977年7月）。

Allee, Mark A., “The Status of Contract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Courts,” in Madeleine Zelin, Jonathan K. Ocko, and Robert Gardella eds.,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